

国际战略与国际关系理论青年论丛

新世纪地区安全危机 及其治理

主 编 / 刘 鸣
副主编 / 顾 炜 汪舒明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nd Its Management
in the New Centur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际战略与国际关系理论青年论丛

新世纪地区安全危机 及其治理

Regional Security Crisis and Its Management
in the New Century

主 编 / 刘 鸣
副主编 / 顾 炜 汪舒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地区安全危机及其治理 / 刘鸣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2

(国际战略与国际关系理论青年论丛)

ISBN 978-7-5201-3742-3

I. ①新… II. ①刘…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世界
IV. ①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8016 号

国际战略与国际关系理论青年论丛 新世纪地区安全危机及其治理

主 编 / 刘 鸣

副 主 编 / 顾 炜 汪舒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许玉燕 卢敏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742-3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系第七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2015 年 10 月 24~25 日）择选论文集，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

前 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正在逐步降低，但各种地区性安全难题频现，各种地区危机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得到了较好的管控，而在另一些地区，危机却上升为地区性冲突，并引发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安全难题和地区危机呈现出新老因素交织、地区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联动的特征。实现对这些安全难题和危机的管控与治理，是维护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稳定与安全的重要课题。

为加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现已更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于 2015 年 10 月 24~25 日在上海召开第七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主题为“新世纪地区安全危机及其治理”。本届论坛于 2015 年 3~9 月开展论文征集工作，得到了全国青年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踊跃投稿。经专家委员会匿名评审，共有 27 篇论文入选正式会议。与会作者经会上讨论后对论文进行了修改，我们从中遴选出 12 篇论文结集出版，并结合事态发展对文章进行了增补。

论文集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当代青年学人对地区安全危机及其治理的理论思考和现实关切。希望本论文集能够启发青年学人继续思考地区危机的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并有助于深入推进相关研究。

代序：克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建设中的认知障碍

——对美国霸权心态与对抗思维的思考*

刘 鸣

按照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的判断，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如何应对这一危险是中美两国政府、战略界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难题。中美关系走向紧张与对抗的原因有很多，美国往往把问题归结为中国的非常态化崛起打破了地区均势。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与奉行例外主义的国家，极少从自身进行反省。本文旨在从美国的角度来探寻其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 无视其他国家的安全必要性及民族感受

美国自身的地位、自我认知以及历史经验决定其先天性地奉行对外怀疑态度，力量平衡与钳制强大的国家是其必然的战略。这其中既包含了美国的特殊身份——霸权国家的基因，也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力量对比变化的压力所造成的结果，同时又是其所谓“天命感”形成的国家优越感的发

* 刘鸣，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关系研究》主编、博士生导师，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这是作者在“第七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原文稿是国际所研究生张骥根据会上录音内容整理的，现经作者修改后发表。

散，视自己是替天行道的警察，其他非西方大国是潜在的“强盗与小偷”。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民主、最高大上的国家，对其他国家是善意与仁慈的，是世界上维护公道的霸权国家，应该享受与其他大国殊异的特权利益。美国认为，这几年随着中国崛起，东亚、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些实质性变化。美国预感到其中潜伏着对其领导地位与其构建的秩序的挑战。危机感、敌对性成为萦绕在美国领导人、舆论界领袖脑海中的思维常态。这种心态不是因为其是小国、力量不足，因而担心周边大国对其安全构成威胁，而是在一种神权式的光环笼罩下的错位反应，认为世界上异质性的大国总是会觊觎美国的财富与地位，会设法与其竞争，对其形成挑战与威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原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埃文斯（Paul Evans）正在领导一个中美加合作课题，试图让美国与东亚各个国家相互能够从对方的视角去正确理解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各种行动的意图，化解敌对性，探寻构建能够共生的新国际秩序规则。但是在与美国学者沟通时，他发觉美国不可能接受这种设身处地的“情感沟通”（empathy）观。在需要美国对其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合理的感受进行量衡时，其国家利益一定处于毋庸置疑的绝对地位。即使这种国家利益在国际法、国际舆论或一般的道理上是荒谬的，但只要美国国内政治与舆论在传统上把其视为不可改变的国家利益或延续性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就会无视对其不利的因素，不惜践踏别国的民族感情与正常的利益。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就是典型一例。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 13 亿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势头，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要交往不要隔绝已是两岸同胞的人心所向，对此，美国却采取了熟视无睹或明肯暗阻的应对手法。

在各个国家追求其安全与合理的军事目标方面，美国认为其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维护者，保持超群的力量优势是必要的，其他大国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与美国相匹配的力量。除非与美国处于同一个阵营，美国需要其分担地区安全责任。如果不是其阵营的国家，发展超越其最低防御需要的军事力量，就有打破美国绝对优势之嫌疑，就是对现状的威胁。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香格里拉论坛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大意如此的

话：中国可以发展军事力量，但这种发展应该是防御性的，不应发展超越亚太地区的力量投射。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承担着全球安全义务，而中国只需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行，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包括航母、远程导弹等都是对美国的挑战。

美国军事实力超群，只要求其他国家畏惧于它，不接受受制于他人。美国 2017 财年的国防预算达到 5827 亿美元，其中 714 亿美元用于研发，75 亿美元用于打击“伊斯兰国”（IS），81 亿美元用于采购新型潜艇，18 亿美元用于采购弹药。其庞大的国防预算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军费，比世界上位于其后的 8 个最大军费开支国的总和还要多。但它总是指责中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太快，用途不透明，是潜在的威胁，从来不承认其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庞大的国防预算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与压力。

美国对在亚洲无限期保持主导地位的执着，主要因为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的实力与生俱来就是良性有益的，如果其他国家不这样认为，那么这是它们的错误。为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批评道，“有观点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无可争议的主宰地位是确保整个亚太长期稳定繁荣的唯一基础，这一观点是一种危险的日趋过时的观念”，但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例外论及国际秩序中霸权力量具有好处的信念中”。^①

秉持这种心态，美国往往倾向于视中国的一系列行动为测试美国的反应，美国当年对苏联也是这种判断，其结果是判断对方的意图总是高估，或从坏处考虑，应对的姿态也因而就必须强硬，不能给对方发出错误的信号。现在美国经常讲中国在东海的“防空识别区”与南海的维权行动及主权范围内的填海造岛行动（陆域吹填）是一种“切香肠式”的进攻，认为中国的每一步行动都有改变现状的意图，如果美国没有反应，中国可能会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美国一般不会考虑中国在南海加固岛礁的必要性：驻岛守军有改善其生活环境的需要；有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有为南海地区提供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生态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各类民事服务的需求。只要涉

^① 《美须弃做亚太老大 避免对华冲突》，《参考消息》2016 年 1 月 4 日。

及中国在海外，特别是在海洋与争议海域的行动，美国就会从军事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考虑，从最坏场景假定中国意在削弱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优势，逐步扩大控制海上的战略空间，最终在岛礁争议国博弈过程中获取力量对比方面的优势。

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问题上，美国也是无端指责中国，提了三条：挑衅行为；单方面改变现状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紧张局势；不接受中国所宣布的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美国还派遣了两架美军 B-52 轰炸机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以示挑战，但是美国显然有意回避了这样的事实，即是美国自己在冷战时期发明了“空中识别区”这个概念的，它在北美最早建立了这种识别区；在冷战时期，美军在东海划设了防空识别区；日本于 1969 年在其专属经济区上空设立防空识别区，中国则在 44 年后的 2013 年才这样做，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从对等角度讲无可厚非。

二 选择性地炒作中国的美国研究成果

美国一部分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在阅读中国国际问题、国家战略的文献时，往往会重点挑选一些讨论如何抗衡美国进攻性的战略、战术，或强硬应对美对华进行施压、干预政策的文章，或者一些意在重塑国际体系，重振中华文明威望与盛世的著述。例如，臆造中国军方存有一个“区域拒止”与“反介入”战略（Anti-Access；Area-Denial）。在中国军方公开发表的研究应对美国干预台海冲突的论文中，并没有所谓的 A2/AD 词汇，但由于是战术应对的论文，必定会涉及以具体特定装备、手段反制敌方航母、军舰、巡航导弹、战斗机的攻击，这是各国军方常规的战法研究。实际上美国把中国发展针对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部队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以限制或控制敌方进入中国外围陆地、海洋和空域，都视为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发展包括东风 21 导弹在内的军事能力，目的之一当然是迫使美军航母远离中国近海。装备新型鱼雷和高速反舰巡航导弹的潜艇，部署侦察卫星和装备高速反舰巡航导弹的战机也都是为了远距离发现并打击对中国的军队、基地构成威胁的外国舰艇。美国作为霸权国家，认为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有权畅通无阻地进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中国有这样的

武器，美国航母等军舰就不敢轻易进入中国的近海域，因而能对其构成挑战，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但美国却忽视了中国基本的安全需求。

此外，美国的研究文献也特别关心中国学术圈讨论“天下体系”这个概念。根据他们的联想性判断，中国有一种战略想在东亚地区恢复朝贡体系，最终分化美国的东亚盟国，把美国边缘化，在太平洋建立中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根据中国的外交学院“美国‘知华派’专家评估项目组”发布的排名报告，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被西方引用最多的是三位，其中包括“天下体系”概念的创建者赵汀阳（另两位学者是阎学通与秦亚青）。^①

近年来，《环球时报》与国内其他门户网站上对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与南海问题等热点有关的评论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是比较激进、强硬或维权立场比较坚定的言论，但这不代表所有或主流的中国精英阶层的想法，更不是中国的国家政策。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界与媒体不间断地把中国报纸杂志上有关这些针对美国军事行动、建立非美国化秩序的文章内容进行夸大性宣传或经常性引用，客观上就使得美国普通民众、其他国家的受众倾向于相信中国正在准备挑战美国，是一个损害美国海外领导利益的国家。在这种铺天盖地、一面倒的舆论引导下，美国国会右翼的和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议员，就会随之起舞，以各种听证会与决议案的方式加大施压力度。在这种妖魔化中国的氛围中，华府的决策层中无论是半明智的，还是本来就不怀好意的官员，就会依据这种美国国内政治的偏见的舆论来同中国讨价还价，迫使中国在一些政策上进行调整，其中网络安全问题就是如此。

三 美国只认可由其创设或尊崇其为老大的 多边机制

美国狭隘的老大心态在多边制度建设中反映得最淋漓尽致。虽然总统

^① 《外交学院美国“知华派”专家评估项目组发布排名报告》，<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116/c1002-26395604.html>；另参见严丹《西方学界进行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信息源分析——以英美学者 SSCI 期刊论文为样本》，《国际观察》2015 年第 4 期，第 94 页。

经常说支持中国崛起的漂亮话，也乐意接受多边主义，但除了美国感到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或与其势力范围没有特别关系的地区外，它实际上坚决反对与抵制由中国创构或发挥主导影响的新多边机制。六方会谈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无法迫使朝鲜让步，也不可能对朝鲜做出战略性让步，而中国对朝鲜具有一定影响力，双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利益也相对一致，所以出于转嫁责任与包袱，它接受了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但是，一旦这种会谈不符合其标准与目标，它又会坚决拒绝参加。对于其他多边或地区新机制，即使中国不排斥美国参加，美国也不愿看到其战后建立的各种机制被中国建立的新机制弱化、分化。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实际上就是在规制上削弱中国在东亚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影响。奥巴马总统毫不掩饰地表示，“TPP 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 21 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①

即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把 TPP 称为“数十年来最差的贸易协定”，认为其过多的金融、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规定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将产生冲击，特别是它被认为与世界贸易的精神相背离，美国也坚持走这条道。

奥巴马总统原东亚顾问麦艾文（Evan Medeiros）2015 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误入歧途”，“如果说与一个日渐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话，那就是如果你屈从于中国人的压力，那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人施加更多的压力。伦敦希望用战术性迁就换来经济上的好处，这是在玩火，可能导致未来产生更多问题”。^② 从这段言辞可以看出，他非常情绪化地反对英国积极与中国发展关系，同时也反对美国对中国崛起进行“包容”，因为这会发出一个信号——美国衰弱了，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国进行交易，而中国会有更多的进攻性行为。基于这种思维，他建议美国政府抵制可能会削弱美国领导地位或利益并由中国制定的地区规则与创设的合作机制，其中亚投行就是这样

① 参见美国总统奥巴马 2016 年 2 月 4 日发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签署的声明》。

② 迪米：《美国忧心英国对华立场》，〔英〕《金融时报》2015 年 10 月 21 日。

一个例子。当中国副财长金立群会见麦艾文，劝其建言美国参加亚投行时，号称白宫的知华派、出身于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麦艾文竟表示，由于亚投行是中国创立的，所以无论有多少好处，美国都不可能参加。

近年来，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少数学者都在不同场合与著述中向美国当局建言，在亚太地区放下“老大”身段，真心诚意地包容中国崛起，与中国分享该地区的权势、利益及分担责任，特别是对应该归属于中国的利益，需要做出让步。这些学者包括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ke Swaine）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前副部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史文以其敏锐的眼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判断，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应该同中国商讨未来本地区秩序的重构问题，达成一个双方可以良性互动、相互包容（mutual accommodation）与制约的机制。^①他还建议美政府应重估对台“六项保证”。怀特为美国开出了应对中国的三个选项：竭力抗衡中国的挑战并在亚洲维持现状；放弃在亚洲的主导性地位，放任中国尝试建立霸权的行动；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维持其在亚洲的强大存在，同时让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怀特断言，绝大多数美国人会接受第一个选项，为数较少的人会严肃考虑第二个选项。绝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第三种选项。怀特坚信，第三种选项，即认可中国是一个可以平等分享权力的大国应是美国唯一理性的反应。^②

另一个例子是“10+3”机制。2001年秋，韩国“东亚合作展望小组”（EAVG）在为东亚地区设计的今后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方式的报告中向“10+3”机制建议，“建立一个能使地区内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和平、繁荣、进步的东亚共同体”，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50多项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动议包括建立东亚自贸区，逐渐改组“10+3”首脑会议，使之发展成为“东亚峰会”。2002年，东亚研究小组的报告提及东亚共同体，并强调建立东亚共同体符合各国的利益和愿望。该报告在当年的“10+3”

① 引自史文（Mike Swaine）2015年11月22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的“淮海论坛”上的演讲。

②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

领导人会议上通过。2003年，在“10+3”的旗帜下，设立了东亚各国各地区研究网，目的是探索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在2004年万象东盟峰会上，东盟提议于2005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首届东亚峰会。^①

美国对这个排除其参与的机制的发展感到非常担心。它怂恿新加坡、日本出头进行活动，最终使东亚峰会的成员扩大到16个，让所谓民主国家——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进入了峰会。这种安排明摆着就是希望“民主国家”壮大声势，制衡中国主导性影响的扩大。

四 现行的众多国际规则是按照美国的理念与利益制订的

这里从三个主要规则方面进行考察。

（一）在网络方面的规则

网络是一个全球公地，过去没有一套规则。由于互联网最早是在美国诞生的，美国始终对互联网域名及根服务区系统实施控制。目前除I、K、M根服务器系统由英国、瑞典与日本管理外，其余都处于美国控制下，特别是母服务器。虽然中国有根镜像服务器，但绝大部分解析都需要经过美国才能完成，美国可以全面监控中国互联网访问数据。网络的游戏规则是按照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知识产权保护与私人企业财产不可侵犯等原则设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在一次会议外的场合对笔者说，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对抗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念的冲突。中国人认为，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道德立场是虚伪与双重标准的，斯诺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国家安全和联邦调查局与9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合作（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谱等）对本国与外国公民进行监控，在一个月内可从全世界互联网上收集970亿条数据，其覆盖范围包括：欧盟办公室，各国的中央和地方金融体系、交通、通信、制造业和能源行业，内装美国生产的芯片的手机等。“棱镜”项目可确保获取海外通信传输路径中的各

^① 马燕冰：《东亚合作发展概况及成果》，《国际资料信息》2007年第3期，第15~16页。

种服务器数据。

既然美国有如此赤裸裸、全覆盖的监听项目，其他有能力的国家当然认为，它们完全有权反其道而行之。但此时美国又按照其理念来制定双重标准的规矩：一国公共机构对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军事部门的网络监控与窃取情报是合法的，但是通过网络进入其他国家的商业公司，获取具有知识产权的资料、技术数据、设计图是违法行为，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如果是政府机构的行为，属于侵害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这种强制推行的理念，貌似区分了政府与私人的不同性质，分割了属于国与国关系中的安全利益需要及对市场公司的正当竞争与公司的创新精神的保护，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不公平的交易理念：美国需要的外国政治与军事情报，其搜集活动就是合理的；美国的商业科技情报无须依赖其他国家，对其进行搜集就是不合法的。它事实上单方面维护了美国具有先天技术优势的情报搜集特权，确保了美国政府利用私人公司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的不公平权力。

（二）双边投资协定（BIT）

现在与美国谈判的只有中国，过去 12 年里，和美国谈过双边投资协定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卢旺达，还有一个是拉美小国，这一点确实令人惊讶。中国没有获得美国与欧盟承认的市场地位，也被排斥于 TPP 之外，但作为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需要进入美国市场进行投资，以提升中国企业的经济竞争力与在世界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制造业 2015 年 1 月至 11 月对外直接投资额比 2014 年同期增长 95%，达到 118 亿美元。在整体上，2015 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了吸引外资额，中国有可能成为直接投资的输出方。同样，中国为了吸引高技术与服务业的国外投资，也需要放宽条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以国民待遇进入各个行业投资。上海自由贸易区推行的负面清单，与美国谈判签订 BIT 就是为中国深化改革并最终与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接轨做准备的。

但是，这种谈判从一开始就是艰难的，因为它是依据美国方面定下的规矩而推进的。美国在贸易网站上公布了一个双边投资协定的模板，任何

谈判都要按照这个模板进行，中国的负面清单在美国的压力下一再缩减，但是，美国方面仍然以各种要求来拖延达成协议。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中方以前“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达成的超长清单为基础，主动将负面清单削减到36项，但是美国方面仍然以各种理由拒绝达成协议。从各方面迹象看，目前阶段美国根本无意与中国达成协议，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核心就是政治上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速度与国内深化改革态势有严重疑虑。在中美经济发展势头与竞争力呈现不利于美国的背景下，美国试图以BIT与TPP作为一种新规则来削弱中国以国家集中调控和以中央大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管理体制，所谓要求中国加强市场调控与经济政策透明度、开放政府采购、削弱大国企的龙头地位等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全面向美国的自由化的市场体制靠拢。

（三）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中的规则

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因为它不希望其作为海洋大国的利益受到公约的约束，但是，吊诡的是，它却要用这个法律来约束中国在南海的正常维权行动。2015年10月召开的南京论坛上，一位哈佛大学的学者说中国台湾方面已经承认“陆地控制海洋”的原则，换言之台湾不再坚持“十一段线”或大陆所称的“九段线”。显然他是误读了台湾方面的立场。台湾方面的正式立场是：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海域属中国固有领土及海域。^①中国认同“陆地控制海洋”的原则，但这个原则的实施不能否定中国在南海岛礁及其周边海域在历史上已经行使的管辖权。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周边海域的声索既来自于自汉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那里的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事实，也基于国民政府1946年派员收复南沙群岛，立碑与派兵驻守，1947年划出十一段线，对南海四群岛及其礁、沙、滩进行命名的历史。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82年签署、1994年生效的，比中国重新控制这些岛礁晚了47年。事实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适用于解决领土主权问题。美国与菲律宾等国纠缠于九段线与《联合国海洋法公

^① 参见中国台湾地区外事部门网站，http://www.mofa.gov.tw/News_Cont。

约》的所谓冲突，试图以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仲裁”来否定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周边海域的声索权，这既是对历史上存在的“谁先发现，谁先拥有与管辖”规则的颠覆，也是对九段线本身的曲解，因为中国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历史权利，拥有在九段线之内的岛屿及相关海域的主权权益，“历史性权益”或“历史性水域”从历史延续地管辖看，就是一种习惯国际法，但它不是一条禁止国际航运的内湖线。

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军舰非法进入南沙渚碧礁周围12海里，2016年1月底“柯蒂斯”号驱逐舰又以“无害通过”名义进入西沙群岛中建岛12海里，试图挑战中国对南海岛礁的控制权。美国的“航行自由计划”虽然是美国卡特政府在1979年制订的一项行动计划，旨在维护其主张的海洋自由原则，防止沿海国家的“过度海洋主张”（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对美国海洋大国地位的挑战，保证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机动畅通；但它这次在南海的实施却是第一次，其目的并不是捍卫美国海军的自由航行权，而是针对中国在南沙7个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因为美国无法从国际法上对中国在自己控制的岛礁上的工程进行挑衅，但它可以以低潮高地没有12海里领海和领海的12海里可以“无害通过”的规则来显示其实力，威慑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力量，挑战所谓中国改变南海现状的行动。

美国的行动虽然理论上没有违反国际法，但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维护海洋自由原则的“和平通行”行动，而是在敏感主权海域具有敌意性或恶意性的武力展示，实际上是滥用规则来达到介入南海争议，通过常态化及逼近性的军事巡逻，体现这个海域常态化的美国军事存在，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给其他声索国以更多的安全信心，限制中国在这个海域依托加固的岛礁扩大正常的军事存在与其他民事活动的目的。

五 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 光谱来观照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高度竞争与对抗的阶段，既有力量关系对比变化的结构性因素，也更多具有美国认知中的历史类比性现实主义与强烈抵触

异质性大国的崛起等因素。这两年美国在形容处于竞争性的中美关系时，有两个概念出现频率颇高——“改变现状”与“修昔底德陷阱”。

2014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西方与日本的一些媒体把现在的中国与威廉一世的德意志帝国相类比，把当前中日与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比作当年的德英关系，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类似德国的发动一战、改变地区现状的老路。这当然是日本以及西方媒体对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与建设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努力的诋毁，也是时空背景完全颠倒的类比。一战的爆发是西方列强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竞相掠夺与瓜分势力范围，构建殖民帝国的必然结果，在一战爆发前的十几年，两大集团就已经形成，所以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战。当前的东亚地区，美日澳等多个双边同盟关系在加强，它们拥有广泛的势力范围，而中国没有海外基地，也没有盟国与势力范围，更没有任何扩张行动。

至于所谓的现状就是战后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轴辐结构，它包括美国的盟国体系、美国对其盟国的安全与领土的保护、小国在政治上对美国领导的顺从、美国在韩日等国保有军事基地与驻扎军队、美国确保其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对地区内海陆空广大区域进行巡弋与监控、用美国主导的多边经济机制向顺从的各国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并确保这些国家开放市场、维持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及战后领土现状等。试图改变其中任何一点，或者侵蚀其基础，美国都认为是改变现状。

所谓现状实际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战后的地区现状一直在渐进地发生改变，有些是冲突、战争或政局变动引起的，有些是冷战中美国与苏联竞争的结果；第二，现状不是公平与合理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以保证一部分国家的利益但损害另一部分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

东亚地区现状的最早改变始于美国违背《波茨坦公告》，即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指令日本重新发展军事力量。日本于1952年成立“海上警备队”，1954年新建航空自卫队，7月颁布《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将保安队、海上警备队分别改称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将陆、海、空三军正式定名为自卫队，并成立了防卫厅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健全了统率指挥机构。